

中國書法史釋

卷四

意的位移

卢辅圣 主编 韩顺任 著





中国书法史绎 卷五

意的位移

卢辅圣 主编 韩顺任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卷五 序

捷足先登的晋唐书家，一得中和，一得极则，占据了书法本体化的最佳地盘。这对于以知识丰厚的文人阶层为社会主角的宋代无疑是潜在的威胁。然而，随着书法的践行场所更多地由丰碑巨额走向案头卷牍，禅宗的发展又与文人阶层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却也给宋人带来意外的活力资源。他们接受了禅宗以心印心的思想方法和适意自然的生活态度，把平衡心理的力量由超尘出世的外部拉回到现实人生和人的个体内心世界，通过内省时空去弥合主客观的裂痕，这就有可能从新的人生哲学即精神解脱，和新的艺术思维即直觉顿悟，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新的审美理想即才情意趣来重塑书法艺术，从而使书法的本体论意义焕然一新。

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作为这次重要转变的过渡性人物，杨凝式和蔡襄值得一书。

晚唐五代，衰陋之气笼罩书坛，除了技巧粗率的狂禅外，以南唐二主为标志的才子书风，同样暴露出艺术情趣的贫乏。而被目为“风子”的杨凝式却超然其外，借助自己对二王传统的深刻理解，成就了一种有法无法、脱略风尘、天真浪漫的鲜明艺术个性。其《韭花帖》的萧散闲逸，《神仙起居帖》的潇洒疏狂，皆不事雕作，一任天机。在当时尚实尚俗观念已然瓦解

而文人艺术趣味尚未重建，书法的发展正遭受着儒学信仰危机与激进主义思潮双重折磨的情况下，杨凝式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宋人对之表现出少有的激赏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蔡襄被列为“宋四家”之一，可是其地位并不稳固，以至时时有人怀疑与蔡京换错了名。原因主要是蔡襄书法以继承二王和盛唐为己任，而与典型的宋代风格有很大距离。用自出新风的标准来衡量，蔡襄当然逊避一头，但从承唐启宋，在唐代严格的法则与宋代自由的意趣之间架设起风格桥梁的历史作用着眼，则其功昭然。面对宋初书坛的混沌、卑弱，他强调着扎实的技巧；面对唐人的重法度、重气势，他追求着温润的韵致；面对晋人的娴静意态、洒落风神，他又关注着精整的旨趣。总之，正是在这些平和蕴藉，不厉不躁，乍看似不经意，实际上极其讲究分寸的非个性化的书法作品之中，透露出一种蔼然自得的文人氣息。到了叱咤一代风云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相继出现，这种文人氣息，就以高扬“新意”的动人姿态，唱出了士大夫们要求挣脱必然之网的不羈心声。

检阅中国书法史，由俗而雅的质变趋势，不外乎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根植于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其艺术现象与积极入世精神相同步；一是沾溉于道家观点的怡情悦性，其艺术现象与消极避世思想相表里。后者虽然为王羲之乃至张旭等不同艺术追求的书家所祖述，但由于时代所限，还未曾从对政治的超脱上升到对社会的超脱，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正面的直接联系，所以在怡情悦性中总是伴随着精神贵族的傲岸气概，从而以积极的姿态推动着书法本体化的发展。对技法矻矻以求、精雕细刻的执着态度，是承载各种哪怕是相对抗的艺术行径的共同基石。然而，唐代书法以其严酷的技巧训练和天才自由挥洒的结合，给后代树立了难以企及的典范，使得绝大多数书写者被拒斥于书法艺术的大门之外。这种高度雅化的结果，不仅对于有效地保证人们广泛参与和精神活动互相渗透的书法泛化传统是严重的背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书法主体抒写性灵的通道。继欧阳修而起的文坛巨擘苏轼具有更加敏锐的战略思想，他首先亮出“我书意造本

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旗号,对唐代法度的重重建构表示明确的反叛。“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新与佳的矛盾,也随着得到了观点鲜明的调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重视顿悟而不是苦修中得其正果,于是成了新的艺术通衢。“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这条新通衢所指向的艺术境界,是一种无所欲求、无所矫饰、自然天成、不避拙失的美。如此一来,书法领域的价值标准就发生了转换,原先以形式技巧及其相应的视像意蕴为本体化支柱的雅化趋势,变成了对文化修养的重视,对“韵”、“新意”、“书卷气”的强调,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和人格、胸次、襟怀的依赖,内心世界与外在形式的沟通交融,因此获得了主体至上的意义。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确实是个前所未有的奇瑰境界。苏轼信手自然、天真浪漫、状类石压蛤蟆的“画字”,黄庭坚奥折奇崛、纵横排奁、直逼荡桨拔棹的“描字”,米芾八面出锋、淋漓痛快、犹如风樯阵马的“刷字”,展现出一个个不同个性、不同阅历的饱学之士对于精神生活的独到心印。《赤壁赋》、《黄州寒食诗》、《松风阁诗》、《诸上座帖》、《蜀素帖》、《虹县诗》这些各具性情的代表作,不论得力于“自出新意”、“自成一家”的创造意识,还是借助于“集古字”、“总而成之”的改革途径;不论体现了“意”、“逸”、“韵”、“趣”、“禅”之类玄虚的美学理想,还是实践了“天真”、“闲淡”、“不俗”、“文气”、“隽雅”之类质实的风格取向,抑或印证着“妙在笔画之外”、“心不知手,手不知笔”、“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之类的表现为主体人格和修养的精神依托,都掩盖不住天才艺术家们对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进行认真思考,并急切地寻找与前代不同的发展基础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具体情势。在衙邸公牍之中“出淤泥而不染”,以病俗、避俗、斥俗为趣尚的士大夫书家,正是基于这个前提,与书法领域千千万万的普通参与者达成了新的默契——降低对基本技巧的要求,解放审美宽容度。

以往时代,人们总是将前人积累的精湛技巧作为发展的

起点,不遗余力地学习传统遗产,在解决形式发展的难题中互相角逐。但从宋代开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决定书艺高低雅俗的关键并不在于形式技巧,而是形式技巧背后的作者人格及其精神力量,字外修养具有比字内功夫更重要、更本质的存在价值。人品与书品由此合二而一。不难想见,在追求作品的格调、气息方面,人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许多技术上极其简陋的作品却有着动人的精神内涵。但与此同时,人们再也没法运用前代的规范来严格地检验后世作品,天才与庸才、创造与破坏之间的界限变得朦胧不清、随心所欲起来。在以内心世界的完善为目标的艺术追求中,整个形式发展史的得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盲视的,而当精神负载超过一定程度,形式自身又不能取得相应的发展时,艺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从刘焘、孙覿、朱敦儒到陆游、范成大、吴玠、张即之,南宋书坛大炽求意问趣之风,却陷入了江河日下的衰颓局面,并且连身居帝位的赵构也无法实现其力挽狂澜的宏愿,原因即在于斯。

卷五 目录

篇一 书法与人文理想·····	1
章一 士大夫的心态历程·····	3
节一 士的两重性·····	3
节二 挣脱必然之网·····	18
节三 对社会的超脱·····	31
章二 新的人生哲学·····	37
节一 末艺说和教化说·····	37
节二 游：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50
节三 对才情意趣的观照·····	55
章三 在道与艺的张力中·····	64
节一 书品与人品·····	64
节二 蔡襄还是蔡京·····	73
篇二 书法的主观表现·····	95
章一 我书意造本无法·····	97
节一 自出新意·····	97
节二 璧美何妨椭·····	110
节三 读书万卷始通神·····	120
章二 书与庄禅·····	130
节一 字外功夫·····	130
节二 韵和不俗·····	141
节三 自成一家始逼真·····	150

章三 卑唐与复古·····	166
节一 痴颠、率意和真趣·····	166
节二 集古出新·····	178
篇三 价值标准的转换·····	197
章一 奇特的阐释机制·····	199
节一 双重身份·····	199
节二 最低限度的陈述·····	208
节三 形式背后的精神蕴含·····	215
章二 复杂的意义系统·····	220
节一 特殊的审美因素·····	220
节二 晋韵与宋意中主体涵义的比较·····	224
节三 宋徽宗的画家视野·····	230
章三 修养及其代价·····	239
节一 书法的扩张·····	239
节二 解放审美宽容度·····	245
篇四 逸之余响·····	255
章一 书卷气检讨·····	257
节一 宋高宗的趣味·····	257
节二 技术本位思想的式微·····	265
节三 从丰碑巨额到案头卷牍·····	272
章二 书法语言规则的崩坏·····	276
节一 刻帖之风两面观·····	276
节二 宋体字效应·····	285
节三 名家与名作的剪刀差·····	291
节四 禅书张即之·····	312
章三 禅的雅化·····	323
节一 从放逸走向清逸·····	323
节二 从姜夔到赵孟坚·····	327
节三 释中和·····	336

篇一 书法与人文理想

主体主观精神状态上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澄怀观道”，通过心理意识作用而使客体象——意象——意境的链式关系得以完成由形象有限到无限的转化，为审美心胸论的完善和中国古典美学意境说的诞生提供了最核心的内容。

对文士心态影响最大的是道学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逸：任之自然、逍遥适性、去繁从简、应物无伤。正是这种被后人称为“逸”的态度与境界，在文士心态出现人格与生活理想分裂之时，使天平偏向于后者。“逸”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不但直接影响了宋时文士们的生活，还影响了书法艺术形态的构成关系，导致了“逸品”风格至上的书位排列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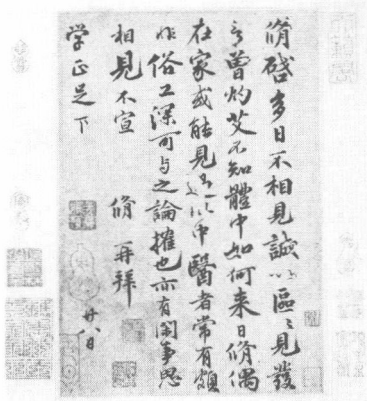
章一 士大夫的心态历程

节一 士的两重性

- 文士形象
- 时空背景
- 二重心态

文人主政为宋代的一大特色。^①研究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文士这个阶层的分析。与其他朝代不同,文士作为宋朝统治阶层的主导群体,具有较好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相同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观念,相仿的意识根基和思维方式,而且具备相通的对外在事物的体认状态、情绪生发和接受机制。^②文士之间的地位竞争贯穿在独特的文士形象标准以及文士资格的竞争之中,儒、道、佛兼涉,文、史、哲兼备,诗、书、画全方位精通被看作是文人的理想。^③此外,文士独具的精神和作为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同一目标体系下的价值观,既强化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也为艺术思想观念的融会贯通,为文人们创造才能的发挥、创造方向的择取提供了保证。

这种新文士形象的确立,依赖于新的审美理论的建立和审美实践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所构成的独特优渥的基础条件。正是依赖和凭借着文士群体这一后盾,宋朝的哲学、文学、美学的观点范畴和关系才能够迅速地被整合,并作用于书法艺术实践;^④也正是由于这一优势,才致使宋代发生在个体精神意识上的审美感性活动和心理过程,有了在大范围内深层次地被书法家敏感接受、评赏和传播的可能。这为我们将要阐说的由晋、唐至宋的书法艺术世界演变过程中,书法专注对象由外部形式结构的现象世界向主体内在的情感世界的转换和深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性心理基础。这一转换被书法家捕捉后,大规模的书法艺术创作则成为最实际、最有力、最有效的验证和实践。没有这一



欧阳修《灼艾帖》

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宋代书法的整体风貌将是不可能出现的。

宋朝书法艺术创造活动中,文士的思考对象始终伴随着书体的规范与挥运的适性自由、前朝之法度与现时之情趣表现、创作和赏析中的感性与理性、政治与艺术关系中的他律与自律等辩证关系而展开。文士们对书法艺术思维实践中所显现的人的本质力量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敏锐的发现,这与当时社会崇尚儒、道、佛三教的思潮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文士们对这些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对艺术本质的领悟,加之对艺术感性活动中生发的生机与灵感极敏锐的认识和捕捉,为该时期的书法艺术整体风格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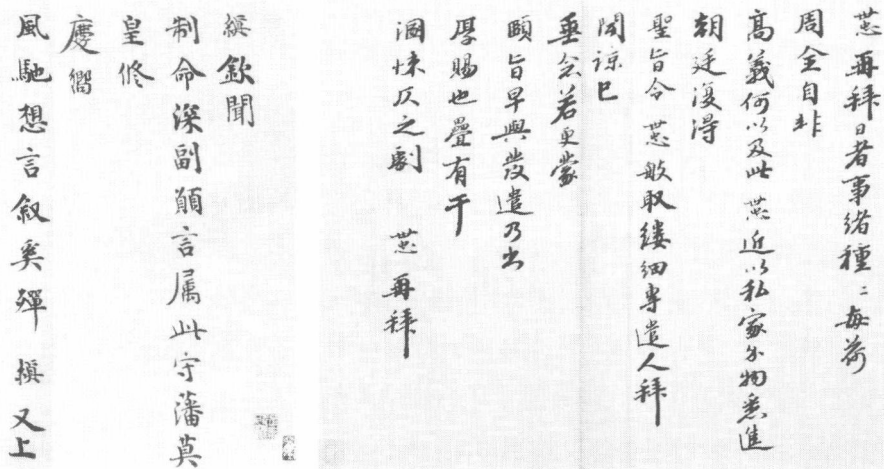
另外,与各个朝代一样,文士身上存在的缺陷在宋朝也受到激发,客观上给书法艺术的发展以意外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儒学所主张的积极入世、入仕的思想已成为文士群体中大多数个体的基本目标,伴以人数众多、目标单一的实际矛盾,必然地导致竞争的激烈化,而工于心计、相互利用、猜忌攻讦则更使个体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文士们强烈的特能参政意识,在政事、国事的讨论中也易于因见解不同和利益差异而形成不同派别,从而导致严重的党争。^⑤在济世治国大政方略中出现了改革与保守之争,最后终致大势不济。在大敌内侵之时也会出现战和之争,贻误战机,坐失空谈,铸成亲痛仇快之错。^⑥这构成了当时的文士心态:陷于痛感人生时光有限、驻之不得而又不得不空耗生命、危世难济的尴尬,普遍地具有身心疲惫、悔恨厌恶之感。这从主观上封杀了文士们关注外部世界的热情与愿望,为其转向关注内心世界埋下了伏笔。

基于上述认识,再对宋朝文士心态进行解析,须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一,以时间岁月为纵,分析文士之人生沉浮所反映出的不同心态;二,以空间环境为横,从文士分处的不同场合、充任的不同角色来推究其心态。

就纵而言,传统儒学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操守心理该是文人们于人生沉浮中所持心态的最精练、最概括、最凝重的总结。这里“达”与“穷”对应着仕途发展中的通达与窘迫,但宋朝的社会条件使“达”、“穷”都不容乐观。国势由强到弱、国土由合到分、党争频仍、令法难行的整体

形势走向,使文人主政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在国势颓弱中的仕途,即使是“达”,那个体之力亦不可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反倒可能在诸多掣肘中其身难保,从而出现穷达更替频繁的情形。与唐之实践相比较,作为笑谈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之实践,证实了文士并不比其他群体更有平天下的治国方略和实践能力,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达”与“济”的联系。随着每一次国势颓落、仕途跌宕,唐朝那种建国后由贞观之治发轫的激昂的治国热情和追求纲纪法度的磅礴气概,那鼓舞激越的“求风骨”的审美理想都逐渐消隐并成为过去。宋代文士们面临更多的是纷扰诡谲的政体、艰涩阻滞的改革、莫测难料的人事和艰难多舛的命运,^⑦兼济天下只能是梦想。况且在文士固有缺陷的催化下,仕途整体上始终呈现穷达反复、达不能济、穷时多于达时、沉时多于浮时的基调,文士心态产生很大变化,情绪波动复杂,凄苦感受良多,逐渐失去了进取的旺盛心情与精力,削弱了对朝廷皇权的信赖,无论对朝野、对世事命运都感到朦胧、厌倦和怀疑,烦闷、苦恼和没落的情绪在普遍弥漫。洁身自好实属不易,沉溺于官能刺激、肉欲享乐者大有人在,而同时程朱理学理欲之辨的正调高唱又挥之不去。如此,文士们沉溺世俗欢乐表象下的精神忧虑、烦闷、无聊、伤感等一应心理矛盾与情绪纠结始终不得解脱。

就整体历史进程而言,唐、宋二朝的士人心态体现出很不



慈再拜曰者事緒種二每為
 周全自非
 高義何以及此慈近以私家外物差進
 朝廷復得
 聖旨令慈敢取縷細身遣人拜
 聞諒已
 垂念若更蒙
 願旨早興發遣乃出
 厚賜也疊有干
 涸味仄之劇 慈再拜

經欽聞
 制命深副願言屬此守藩莫
 皇修
 慶嚮
 風馳想言叙奕輝 撰又上

韩缜《钦闻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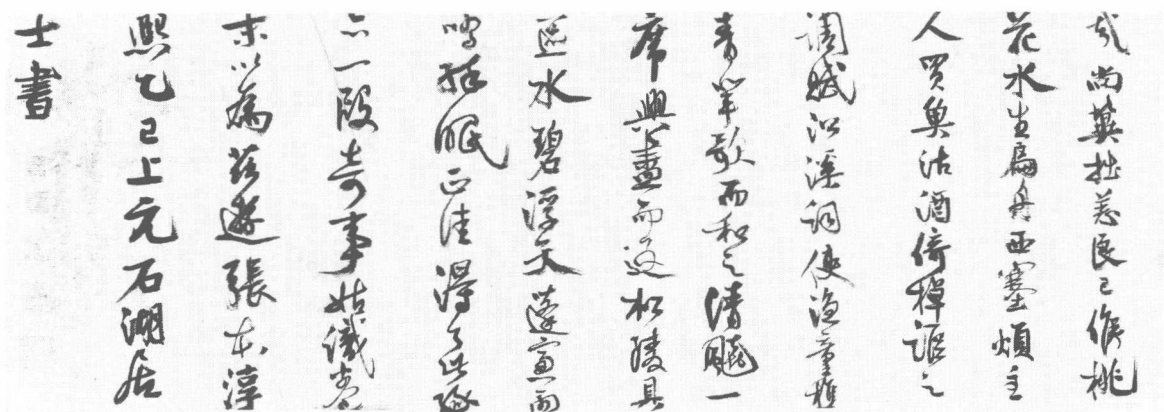
韩世忠《高义帖》

相同的侧重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理想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上。前者为热情投身与执着追求,后者为相对淡漠、厌倦、伤感。也就是说,两宋时期(尤为南宋)文士们实际上已失却了“兼济”的雄心,做到“穷达”都能“独善”就相当不错了。有趣的是,这客观上促使作为“独善”方式之一的书法艺术在时空上赢得了更多被关注的可能。

从横的方面看,文士们的作息方式可分为两种场合:正式的社会公务性场合和闲适的私人生活性场合。通常文士们在不同的场合会择用不同的生活原则,即使尊礼如孔子、倡理如朱子也不例外。^⑧在朝廷、政务、社交等需要严格恪守礼教纲常的正式场合,因牵涉到立德学道、建功立业的重大入世之目的,一般会理性地选择个人主体意识服从社会主导意识的原则,强调人和人的情感的社会性,强调用符合社会化规范标准来认识事物、评价价值。这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对象上,即偏重于社会性伦理情感的表达,以及艺术家对外部世界全部认识和评价中的礼教因素部分;而在家庭、私交、挚友雅集等需要宽松氛围的私人生活场合,因这些场合中一个基本思想指向是类似庄子的“保身”、“全生”、“养生”、“尽年”,^⑨故而显露真情真我,一切随顺自然,使个体生命得到自由的发展,不受各种伤身害身、违反自然的欲求所影响的态度占主导地位。

这种人生心态二重化的矛盾性,实际上贯穿着阶级社会以来各阶段全部的文士生活历史,而亲和于儒家“群”之情感的文士们总是趋向于重视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崇尚着人性自由与礼教纲常之统一的原则。但这种理想的实现依赖着两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纲常规范的社会信度和个体心境。尽管理学把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到极致的思辨形态并取得独尊地位,但两宋仍然使文士们陷入“达”不能“兼济”、“穷”难以“独善”的社会环境。社会现实的整体下颓走势,使得文士们纵有完备的正统伦理思想高悬,也不能在思想上消解对世事命运感到悲观、厌倦、苦恼的情绪。文士心态的二重性矛盾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并广泛蔓延开去。这种政治生活态度与人生生活态度的二重性矛盾,在宋时已被思想界特别关注。

正是在这种对身外世界迷茫和厌倦心理的作用下,人们转



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局部)

而趋向追求对隐匿的自我内心世界的关注、独省和开掘也就势在必行了。也正是这种因穷达关系趋向于“独善”、心态二重性矛盾关系发生严重分裂而出现的向人性自由倾斜的趋势，为文士们在书法艺术活动中把注意力由对外在形式结构因素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内在自我表现性的情感意蕴的特别审视，提供了普适的心理环境条件。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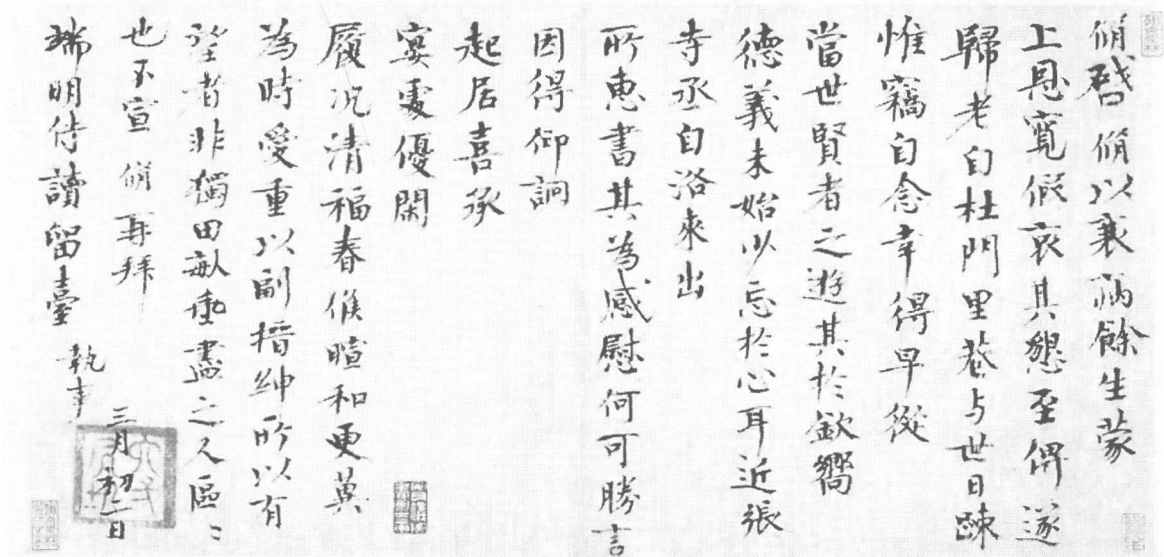
① 刘向曾言：“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说苑》卷一五“指五”条，见《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据1998年8月版，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第205页。政权的获得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前提。宋代“黄袍加身”的政权获得方式使得赵匡胤存谋取国权、称帝为君之疑，如清代王夫之曾论之曰：“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见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一”，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1页。采用何种统治方式来稳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成为北宋赵氏皇权的首要和重点工作，“杯酒释兵权”和“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赵宋王朝基本的治国方针。

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收兵权”条：“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帝即位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因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清初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三《宋纪三》：“乾德元年春正月，‘初命文臣知州事，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也。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

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以上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指出：“概括言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称为建立期。所谓建立期是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这一理想也获得皇帝的正式承认，所以南宋的史浩向孝宗说：‘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是仁宗以来‘祖宗之家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则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回响。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这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王安石因此才毅然接受了变法的大任。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之下，王安石才可以说：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文彦博才可以当面向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程颐才可以道出‘天下治乱系宰相’那句名言。尽管以权力结构而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称之为转型期。所谓转型是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型范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这是南宋士大夫的共识。但这场实验的效应，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都继续在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王安石的幽灵也依然附在许多士大夫的身上作祟。最明显的，理学家中有极端反对他的，如张栻；有推崇其人而排斥其学的，如朱熹；也有基本上同情他的，如他的同乡陆九渊。无论是反对还是同情，总之，王安石留下的巨大身影是挥之不去的。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朱熹的时代也就是‘后王安石的时代’。”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第8—9页。

许总认为：“社会性的崇文风气，文人政治地位的大大提高，也就进而造成宋代特有的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关系。宋代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但宋代文化的最重要特点并不是简单的儒学复兴，而是在于对儒家思想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并使其无比的权威性和鲜明的实践性构成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精魂。在宋代，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是同时成为其思想和主张的实践者，学术领袖和政治领袖逐渐统一起来。学术领袖对学术文化的倡导，与其所代表的阶层的政治利益也是全然一致的。比如，同为标榜孔、孟，司马光博采历代典籍编纂成巨著《资治通鉴》，意在坚持‘纯儒’之一如旧制，显然体现了其所代表的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而王安石依托孔子立言，依托《周礼》变法，进而创建所谓‘新学’的思想体系，则又是其所代表的革新派政治主张的理论升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关系，显然使得作为一个阶层的文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根本的改变和普遍的提高。”“宋代文人始终居于最高政治权力圈中，完全改变了唐代以前那种‘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境况。”见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引论卷之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尺牋》

版，第39、42页。

许总提出：“在北宋中期，文人官居高位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欧阳修稍前或基本同时，进入国家政权核心的文人就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韩维、司马光等，特别是范仲淹和司马光，除作为宰辅重臣和文坛巨擘之外，还是著名思想家，与欧阳修一样，在宋学建构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文学角度而言，他们都怀抱大志，政务之余多有文章诗赋之作，相类的身世和经历，使得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大体相似的风格。”（第41页）“到北宋后期，确立了新素质的政治、文化都达到隆盛状态，具有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特性的宋代文学也发展到高峰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紧接欧阳修之后的领袖人物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主要活动于神宗朝，在政治主张上与欧阳修有着直接的联系，早在仁宗朝他就曾上书极言变法的重要性的必要性，到神宗朝，更成为熙宁新法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官至宰相，深受皇帝信任。在思想上，王安石创立了宋代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新学，在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上，王安石对‘先儒传注’大加改造，并以之作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内涵，王安石的文学生涯表现为北宋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紧接欧阳修之后的第一个大家。苏轼与王安石力主新政不同，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但他又不满旧党的倒行逆施，因此既受到变法派的打击，又受到保守派的排挤，屡遭贬谪，仕途坎坷。但是，纵观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仍然曾经受到重用，在哲宗朝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甚至礼部尚书，可以说，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苏轼创立的蜀学和苏门文派，在宋代哲学史和文学史上之所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与他的政治地位也是分不开的。”（第41—42页）“南渡之后，虽然时局变乱，政治腐败，但著名文人仍然受到朝廷重用，政治地位丝毫不减往时。”（第42页）

② 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五章第二节中，就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内容做出了如下综述（见第241—